

中国式现代化专题

对外投资合作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知识扩散*

陈兆源 李晨阳

内容提要：中国式现代化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中国对外投资合作在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的同时还反映并扩散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知识，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启动或推动其现代化进程。中国政府依靠与企业 and 银行的紧密协调，超越政府与市场简单对立思维，通过发起并实施任务导向型投资而成为市场的重要创造者，推动了中国国内的现代化建设。本土政商关系亦塑造了中国对外投资合作的特质，使中国企业总体上体现出不同于西方传统资本的竞争优势，即较长的时间视野和较高的风险容忍度。蕴含中国发展知识的对外投资合作有望满足东道国在基础设施投资和国家能力建设两方面的需求，从而助力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对中国企业参与巴西电力行业投资的案例考察基本印证了上述理论观点。本文侧重从“走出去”而非“引进来”的角度讨论中国式现代化中的对外开放议题，基于中国本土政商关系提炼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知识，以对外投资合作为载体构建了一个跨国政商互动的分析框架，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学理意义和世界意义，以及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世界现代化的理论机制和有效路径。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 对外投资合作 发展知识 政商关系 基础设施投资 国家能力建设

作者简介：陈兆源，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发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李晨阳，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649 (2023) 06-0018-22

*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社会调研项目“新形势下中国企业高质量开展‘一带一路’基础设施投资合作的优势、挑战与建议”（编号：2024QNZX021）的阶段性成果。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正确处理好自立自强与对外开放的关系，不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以此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空间。^① 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各国应当携起手来，实现和平发展、互利合作、共同繁荣的世界现代化。中国追求的不是独善其身的现代化，而是期待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各国一道，共同实现现代化。^② 然而，无论是中国式现代化还是世界现代化都不是自然到来的，需要欠发达国家在特定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下有意识地改造经济技术和学习世界先进科技，带动广泛的社会改革，从而主动追赶先进工业国并适应现代世界环境的发展。^③ 拉美国家在第三世界中较早获得独立，也较早地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下开始探索现代化道路，被认为是现代化的“实验室”。^④ 在拉美的现代化道路上，外国资本因其重要性和争议性而备受关注。^⑤ 除资本等物质因素外，包括拉美在内的发展中世界还需要发展知识作为智力支持。发展知识是重要的发展资源，促进全球发展知识分享亦是全球发展倡议合作的重要方面。^⑥ 基于中国实践提炼的发展知识既有助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和借鉴。鉴于此，本文旨在讨论的总体问题是：中国对外投资合作如何在满足发展中国家资金需求的同时反映并扩散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知识，以及上述过程如何助力发展中国家启动或推动其现代化进程。

当前这轮现代化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展开的，故对外开放对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具有重要作用。但对外开放也增加了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的不确定性，甚至可能因过度依赖外部资本和市场而在世界体系中被锁定在与发达国家的

① 习近平：《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处理好若干重大关系》，载《求是》，2023年第19期，第8页。

② 习近平：《建设开放包容、互联互通、共同发展的世界——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载《人民日报》2023年10月19日第2版。

③ 关于现代化概念和含义的讨论，可参见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8-18页。

④ 韩琦主编：《世界现代化历程·拉美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

⑤ 主要争论体现为依附理论和现代化理论的争论，参见 Stephen Haggar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Latin America”, in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 Vol. 24, No. 1, 1989, pp. 184-208.

⑥ 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全球发展报告》，2022年6月，第33页。<https://www.cikd.org/ms/file/getimage/1538894999100370945>. [2023-11-10]

“中心—边缘”结构中。^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资本“走出去”正变得愈发重要，引起国际学界和政策界广泛关注。^② 中国总体按照“政府引导、企业主导、市场化运作”的原则，鼓励和支持有实力、信誉好、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走出去稳妥有序开展对外投资合作。以中国对拉美的投资合作为例，中国2022年在拉美的直接投资存量为5961.5亿美元，占中国对外投资总存量的21.6%，是2012年存量的近9倍。^③ 2012—2022年间，中国在拉美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年均达120.4亿美元。^④ 拉美已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第二大目的地和国际产能合作的重要伙伴。^⑤ 中国对拉美的投资合作十分重视公共部门，在可再生能源投资上一直处于领先地位。^⑥ 事实上，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中国努力推动并引领了新一轮全球化进程。^⑦ 中国资本“走出去”的同时也伴随着中国发展知识的扩散，由此提升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影响力并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对世界现代化的意义。

既有研究已注意到中国式现代化中的对外开放议题，不过仍在两方面存在可拓展的空间。^⑧ 一方面，绝大多数相关讨论仍侧重于“引进来”角度，缺乏从中国“走出去”实践出发的专门讨论。另一方面，也更为关键的是，

①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Modern World - System I*,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4; [德] 安德烈·冈德·弗兰克著，高钰、高戈译：《依附性积累与不发达》，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年；[阿根廷] 劳尔·普雷维什著，苏振兴、袁兴昌译：《外围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埃及] 萨米尔·阿明著，高钰译：《不平等的发展：论外围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乌拉圭] 爱德华多·加莱亚诺著，王玫等译：《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

② 围绕中国资本“走出去”的相关争论可参见熊婉婷、张家诚、孙靛莹：《生产性债务：中国海外主权贷款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载《世界经济》，2023年第9期，第3-28页。针对拉美的相关讨论可参见Stephen B. Kaplan, *Globalizing Patient Capital: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ese Finance in the America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1.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编：《2022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2023年，第21页。

④ 参见国家统计局数据。<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 [2023-11-10]

⑤ 王永中、徐沛源：《中国对拉美直接投资的特征与风险》，载《拉丁美洲研究》，2018年第3期，第51-71页。

⑥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ECLAC),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2023*, Santiago, 2023, pp. 188-189.

⑦ 孙吉胜：《中国式现代化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载《国际问题研究》，2022年第6期，第12页。

⑧ 刘洪槐：《对外开放与中国式现代化》，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5期，第5-14页；胡鞍钢、张新、张鹏龙、鄢一龙：《中国式现代化全面开放格局的发展历程、面临挑战及战略构想》，载《国际税收》，2023年第9期，第3-14页；迟福林：《以制度型开放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东的实践经验与探索创新》，载《人民论坛》，2023年第6期，第6-8页。

在讨论中国式现代化与对外开放时，既有研究没有对中国式现代化与世界现代化（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互动进行足够的理论探讨。为此，本文可能的贡献体现在：一是从对外投资合作这一“走出去”角度出发讨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的对外开放议题；二是从中国本土政商关系出发提炼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知识，构建了一个以对外投资合作为载体的分析框架，用于讨论中国式现代化与世界现代化的互动。在总体问题之下，本文将着重分析前后关联的三方面内容：中国式现代化所蕴含的发展知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知识如何塑造了中国对外投资合作的特质，以及中国对外投资合作的特质如何有助于满足发展中东道国实现现代化的需求。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对中国企业参与巴西电力行业投资的案例考察，本文聚焦对外投资合作这一具体视角，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学理意义和世界意义，以及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世界现代化的理论机制和有效路径。

一 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发展知识：以政商关系为视角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蕴含的发展知识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理论化，中国本土政商关系无疑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察视角。从政商关系的角度看，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实践体现出的一个重要的发展知识便是政府可以依靠与企业部门和银行部门的紧密协调，超越政府与市场的对立思维，成为市场的重要创造者。

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往往倾向于认为政府（国家）和市场之间存在某种程度的对立关系，故其认为在市场经济中，政府需要做的仅是通过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来修复市场失灵。^① 这种观点简单化了政府（国家）和市场的关系，实际上，历史和现实中政府所做的事情远远不止修复市场失灵。早在 20 世纪中期，波兰尼在研究现代自由市场的演化进程时就发现“通往自由市场之路的打开和保持畅通，有赖于持续的、由中央组织调控的干预主义的

^① 相关讨论可参见 Charles Wolf, *Markets or Governments: Choosing between Imperfect Alternatives*, Cambridge: MIT Press, 1988, pp. 1 - 15. 由此，经济学也产生了一个专门的分支学科——公共经济学，据《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公共经济学分析的起点就是现实中存在的诸多市场失灵现象，以达到“帮助、支持、补充、修正或理顺市场”的目的。

巨大增长”^①。也就是说，自由市场的形成这件事情本身就离不开国家的作用。对于现代化进程中的经济发展而言，政府作为市场创造者这一角色与作为市场修复者的角色同样值得关注。马祖卡托认为，政府修复市场失灵所描述的其实是政府在现有的稳定状态下给市场上已经存在的轨迹打补丁^②，但从本质上来讲，发展更多的是对现有轨迹的变革，比如中国从一个农业国变成工业国，而不仅仅是在满足现状条件下对资源的最优化配置。借用熊彼特的经典表述，发展不是因循守旧的“循环流转”，而是意味着“新组合”的出现，“用不同的方式去使用现有的资源，利用这些资源去做新的事情”^③。如果这里用不同方式“做新的事情”的行动主体是政府，那么政府的作用就不仅仅是克服原有市场中的市场失灵，而是在创造新的市场。

在经济发展的历史上，政府创造市场的一种重要方式是主导发动任务导向型投资（mission-oriented investment）。^④作为一种经济联系，市场自身没有方向，也无法自发实现发展所需要的结构性变化^⑤，为了实现这些变化所做的投资可以视为任务导向型投资，需要市场中的经济主体来主导并组织，在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这种组织工作很大程度上需要国家来参与甚至引领。此时，国家不应该只是维持经济平衡以及提供公共物品，还应该促进可投资资源的增加以及建立将可投资资源转换为生产性投资的机制。国家需要综合运用激励、控制和风险分散机制等政策手段，去引导或者治理资源配置的市场过程，从而产生不同于自由市场条件下的生产与投资结果。^⑥

不过，若希望通过实施任务导向型投资创造新的市场，政府不能光有意

① [英] 卡尔·波兰尼著，冯钢、刘阳译：《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20页。

② Mariana Mazzucato, “From Market Fixing to Market – creating: A New Framework for Innovation Policy”, in *Industry and Innovation*, Vol. 23, No. 2, 2016, p. 144.

③ [美] 约瑟夫·熊彼特著，何畏、易家详等译：《经济发展理论》，北京：商务出版社，1990年，第72-76页。

④ Mariana Mazzucato, “From Market Fixing to Market – creating: A New Framework for Innovation Policy”, in *Industry and Innovation*, Vol. 23, No. 2, 2016, pp. 140-156.

⑤ 路风、何鹏宇：《举国体制与重大突破——以特殊机构执行和完成重大任务的历史经验及启示》，载《管理世界》，2021年第7期，第15页。

⑥ Robert Wade, *Governing the Market: Economic Theory and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East Asian Industrializ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26-29.

愿，还得有能力将其落地实现。^① 政府是国家的行政机关，将对具体行业领域的投资意愿转化为可以实际落地的投资能力可以被视为国家能力的组成部分。^② 现有文献早已关注到国家能力不仅体现在宏观整体层面，同时也体现在产业层面，其中一个重要的研究主题是工业行政。根据宋磊等的总结，工业行政这一主题对理解发展型国家和产业政策相关的政府作用机制非常重要，对中国而言尤为关键。^③ 在已有研究中，路风和蔡莹莹明确提出国家建设需要包含政府的工业行政能力，并将之定义为“政府能够通过规划、政策等手段直接影响工业发展方向和企业行为的能力”，也就是说，工业发展不仅取决于企业的能力，也取决于政府的能力。^④ 封凯栋等从产业政策过程的角度，将国家针对特定工业实施政策并实现目标的能力分为三个层次：对工业产业的理解能力、政策的制定能力和政策的执行能力。^⑤ 上述研究均对本文从产业层面关注国家能力提供了重要启发，相比之下，本文所讲的任务导向型投资能力聚焦于投资活动这一类经济和产业发展中的具体活动。一个国家发起任务导向型投资的能力越强，越有可能在任务目标的方向上完成投资活动。正如马祖卡托研究任务导向型投资时所说，国家希望通过创造技术、产业部门和市场来推动经济转型，前提是要有进行长远思考的才智和推动进取性政策的能

① 在经济发展的追赶阶段，发展中国家利用“后发优势”时尤其需要重视市场创造中的政府作用。相关讨论参见 [美] 亚历山大·格申克龙著，张凤林译：《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林毅夫著：《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② 根据斯考切波的经典定义，国家能力是国家行为体执行官方目标和政策的能力。参见 Theda Skocpol,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Strategies of Analysis in Current Research”, in Peter B. Evans, et al. (eds.),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8。在讨论国家能力时，有的研究将其放在经济现代化的情境下，着力考察了国家助力经济发展的能力。参见 [美] 戴维·瓦尔德纳著，刘娟凤、包刚升译：《国家构建与后发展》，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美] 阿图尔·科利著，朱天飏等译：《国家引导的发展：全球边缘地区的政治权力与工业化》，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

③ 宋磊：《工业行政能力：产业政策研究的重要主题》，载《公共行政评论》，2019年第1期，第1-4页；宋磊、孙晓冬：《中国工业行政研究析论》，载《国家现代化建设研究》，2022年第3期，第138-150页。

④ 路风、蔡莹莹：《中国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挑战政府能力——从产业政策的角度看中国 TFT-LCD 工业的发展》，载《国际经济评论》，2010年第5期，第42页。

⑤ 封凯栋、姜子莹、赵亭亭：《国家工业理解能力：基于中国铁路机车与汽车产业的比较研究》，载《社会学研究》，2021年第3期，第92页；姜子莹、封凯栋：《经济发展变迁中的国家工业理解能力》，载《学术研究》，2022年第6期，第97页。

力。^① 晚近亦有研究从“创造市场的国家”视角看待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对高铁等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② 新中国成立以来，从“156项工程”到“两弹一艇一星”，从“南水北调”“西电东送”“西气东输”到“东数西算”，可以看到不同层次和行业中很多任务导向型投资活动，而且很多投资活动都已经成功落地。^③

接下来的问题便是为何中国政府有这样的能力，得以成功发动许多任务导向型投资来创造市场？这一问题的答案可以有很多，此处想要强调的观点是：紧密协调的政商关系是政府拥有这种能力的重要政治基础。本文所说“政商关系”中的“政”自然是指作为国家行政机关的政府，而“商”则不仅是指代表实体经济的企业^④，还包括代表金融经济的银行^⑤。所以更具体地说，中国的政商关系其实包含“政府—企业关系”和“政府—银行关系”两个方面。^⑥ 从比较政治经济学角度看，无论是政府—企业关系还是政府—银行关系，本质都是一种制度化的权力关系。^⑦ 改革开放以来，这两组权力关系相比于计划经济时期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新的权力关系结构在激发经济活力的同时，依然通过以下特征保留了国家在必要时直接协调企业与银行参与经济活动的的能力。

一方面是政府—企业关系。中国的关键资源继续维持公有制，且关键行业仍由国有企业主导。中国政府不仅仅提供公共服务，同时也作为国家的行

① Mariana Mazzucato, “From Market Fixing to Market - creating: A New Framework for Innovation Policy”, in *Industry and Innovation*, Vol. 23, No. 2, 2016, pp. 150 - 151.

② Karl Yan, “Market Creating States: Rethinking China’s High - Speed Rail Development”, i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30, No. 4, 2023, pp. 1220 - 1237.

③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中国在推动任务导向型投资方面非常出色，但这种能力并非中国独有，其他国家也存在开展任务导向型投资活动的案例。相关案例可参见 Douglas K. R. Robinson and Mariana Mazzucato, “The Evolution of Mission - oriented Policies: Exploring Changing Market Creating Policies in the US and European Space Sector”, in *Research Policy*, Vol. 48, No. 4, 2019, pp. 936 - 948.

④ 企业在本研究中被采取狭义的理解，主要指非金融企业，不包括金融机构。

⑤ 此处所指的银行亦包括中央银行和政策性银行。

⑥ 在讨论政商关系时，既有研究通常侧重政府与实体企业的关系，将政府与实体企业、政府与金融机构的关系同时作为考察对象并讨论“政府—企业”和“政府—银行”两者互动关系的研究仍然不足。事实上，在东亚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政府与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的关系相当重要。相关讨论参见 Chalmers A. Johnson, *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The Growth of Industrial Policy, 1925 - 197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Jung En Woo, *Race to the Swift: State and Finance in Korean Industrializ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1.

⑦ 关于制度化对现代化的重要性，可参见 Samuel P. Huntington,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3.

政机关来维持土地和自然资源的公有制。^①因此，人们平时俗称的地方政府“卖地”并不是土地所有权的转移，而是使用权的转让。同时，尽管如今民营企业的发展繁荣程度已经和改革开放初期不可同日而语，中国也早已成为外资企业重要的直接投资目的地和市场，但是中国仍然存在规模庞大的国有企业部门，国有企业在军工、能源电力、交通等事关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诸多关键行业或战略性行业维持着主导地位。通过对基础设施和重大技术项目的投资，中国政府拥有可以直接介入实体经济活动的能力^②，这有利于国家根据任务目标协调企业开展投资活动，将现代化进程中的客观需要变成指向特定任务的投资需求。

另一方面是政府—银行关系。现实中，投资计划并不总是完全依靠自有资金支持，因此任务导向型投资的融资活动会受到政府—银行关系的影响。中国的银行可大致分为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以及政策性银行三部分。与一些西方国家所谓的“独立”中央银行不同，我国的中央银行即中国人民银行是中央政府的组成部门，而非独立于政府。^③同时，中国人民银行在货币政策领域的自主决策权限也有着明确的限制：涉及年度货币供应量、利率、汇率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重要事项的决定，需要由国务院批准之后执行；除此之外，有关货币政策事项可以自行决定后执行，但也须报国务院备案。^④在这种政府—银行关系下，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相对更为容易，结构性货币政策（如抵押补充贷款等）也可更好地服务于任务导向型投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商业银行中原先四大国有独资专业银行的格局已经被打破，不过，无论是银行机构数量的增加还是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革，都没有改变国家对商业银行系统的主导作用。^⑤可见，中国的商业银行并不是一些西方教科书中按照利润最大化原则进行资产负债表管理的金融机构，而是国家

^① 中国宪法中规定，城市土地均属国有，农村和城市郊区土地属于国有或集体所有，除了法律规定归属集体所有的情况之外，所有的自然资源也均为国有。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8年。

^② 路风：《中国经济为什么能够增长》，载《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1期，第59页。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4年。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4年。

^⑤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明确规定，商业银行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国家产业政策指导下开展贷款业务。参见中国人民银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融工作文献选编》，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7年，第587页。

发展的重要参与者。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十年后的 2018 年，图兹对全球金融危机进行总结时认为，中国的经济刺激方案之所以有效是因为中国成功实现了大规模政府支出和大幅宽松货币政策的结合，而中国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国家不但可以影响许多工业企业，中央银行还可以直接影响银行部门的信贷发放。^① 中国专门的政策性银行出现于 1993 年金融体制改革之后，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三家政策性银行的成立在原来专业银行体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划分了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两个部分，政策性银行的发展也促使开发性金融在中国不断发展完善。^② 开发性金融是一种实现政府目标的金融形式，“政府入口、开发性金融孵化、市场出口”是开发性金融的重要运行机制。^③ 卡普兰在研究中国的海外开发性融资时，将中国政策性银行的目标概括为不同于“利润最大化”的“市场最大化”，即帮助中国企业在发展中国家创造新的海外市场。^④ 其实，这一结论也完全适用于中国国内。对于任务导向型投资而言，政策性银行有利于扩大其中长期资金来源。

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知识并非仅仅包括对政府“应该”创造市场的理论认识，更重要的是，中国式现代化蕴含了政府“应该如何”通过塑造政商关系来创造市场的发展知识。概括而言，在政府创造市场的过程中需要紧密协调的政商关系服务于国家现代化。中国政商关系与任务导向型投资的关系可大致总结如图 1。紧密协调的政府—企业关系有助于创造投资需求，紧密协调的政府—银行关系则有助于为投资活动提供融资支持，两类关系共同促进了任务导向型投资的实现。相较于西方新自由主义理念中的应然特征，这一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生成并得到实践检验的本土政商关系更有助于实现政府、企业和银行之间的良性互动。得益于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发展知识，中国的本土政商关系不仅促进了国内的持续高投资，也塑造了中国企业在开展对外投资合作时不同于传统发达国家跨国企业的竞争优势。

① [英] 亚当·图兹著，伍秋玉译：《崩盘：全球金融危机如何重塑世界》，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21 年，第 270-271 页。

② 吴雨珊著：《开发性金融创世记》，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 年。

③ 陈元：《发挥开发性金融作用 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载《管理世界》，2004 年第 7 期，第 1-5 页；陈元：《开发性金融与中国城市化发展》，载《经济研究》，2010 年第 7 期，第 4-14 页。

④ Stephen B. Kaplan, *Globalizing Patient Capital: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ese Finance in the America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1, pp. 63-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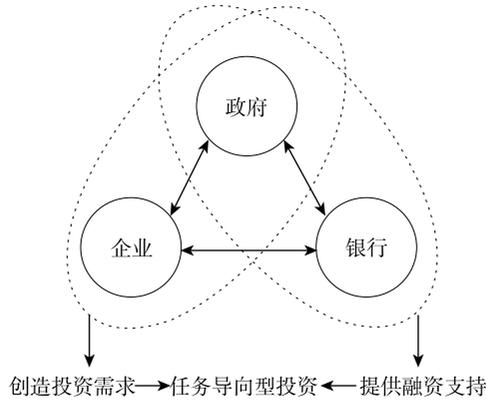


图1 中国政商关系与任务导向型投资

资料来源：笔者绘制。

二 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知识扩散：以对外投资合作为载体

一国的政商关系不仅对该国内部的政治经济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也会深刻地影响到该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实践。在早期研究发达国家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时，海默曾颇为正确地指出，企业在海外市场投资是具有先天劣势的，如果能够进行海外投资，那么一定具备某种优势可以克服这些劣势，支持企业“走出去”开展竞争。^① 作为新新贸易理论（New - New Trade Theory）的代表性成果，梅利茨及其合作者构建的企业异质性模型则论述了生产率高的企业更倾向于开展对外直接投资。^② 作为对上述经典理论的一种推论，可以说企业之所以能够参与对外投资合作，是其将源自本土政商关系的竞争优势进行国际拓展的结果。

由此以来，对外投资合作便可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知识扩散的有力载体，在中国式现代化与世界现代化的互动关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图2所示，基于中国本土政商关系提炼的发展知识不仅有助于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① Stephen Herbert Hymer, *The International Operations of National Firms: A Study of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76, p. 52.

^② Marc J. Melitz, “The Impact of Trade on Intra-Industry Re-Allocation and Aggregate Industrial Productivity”, in *Econometrica*, Vol. 71, No. 6, 2003, pp. 1695 - 1725; Elhanan Helpman, et al., “Export Versus FDI with Heterogeneous Firms”, i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4, No. 1, 2004, pp. 300 - 316.

而且这一政商关系所形成的竞争优势还反映在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合作的特质中。进一步地，中国企业在对外投资合作中体现并扩散了相应的发展知识，通过满足发展中东道国的经济发展和能力建设需求来助力东道国实现现代化。鉴于本文上一部分已从政商关系的角度总结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知识，此处将重点讨论本土政商关系（具体而言即政府—企业关系和政府—银行关系）如何塑造了中国对外投资合作的竞争优势，并在此过程中通过发展知识的扩散来助力东道国实现现代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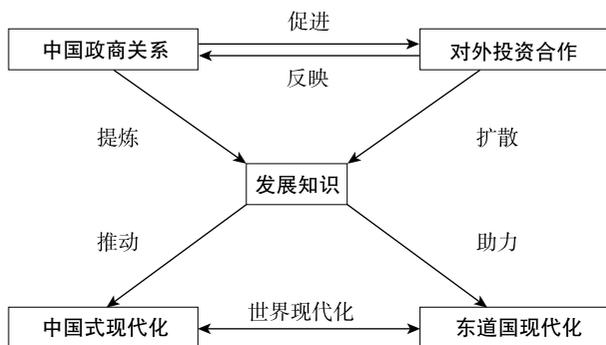


图 2 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知识扩散

资料来源：笔者绘制。

无论是国家竞争优势还是企业竞争优势，都需建立在一定差异化战略的基础上。^① 换言之，对中国“走出去”企业竞争优势的理解离不开对其行为特质的观察。在对外投资合作中，当前中国投资者相较以七国集团为代表的传统投资者的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更长的时间视野，二是更高的风险容忍度。^② 中国投资者之所以具备这些竞争优势，与中国本土的政商关系密不可分。

一方面，中国企业在对外投资合作中拥有较长的时间视野。时间视野是刻画行为体特征的重要维度之一，反映了不同行为体对于应从多期限的范围内看待利益和绩效的主观认知和客观约束，从而影响行为体的战略选择。^③

^① Michael Porter, *Competitive Strategy: Techniques for Analyzing Industries and Competitors*, New York: Free Press, 1980.

^② 当然，七国集团投资者和中国投资者内部亦存在差异，此处仅是就平均而言。

^③ 陈兆源：《时间范围与国际投资合作中的耐心资本》，载《世界政治研究》，2023 年第 1 辑，第 49 页。

中国“走出去”企业更长的时间视野呼应了国际发展合作研究对中国“耐心资本”的讨论。在林毅夫等学者看来，耐心资本是投资于一种“关系”的资本，其提供者愿意看到接受者在未来获得发展，从而获得可观的回报。^① 耐心资本意味着投资者在投资决策阶段便打算进行较长期限的投资，且在投资经营阶段不强求短期财务回报，并在面对不利条件时谨慎地动用其“退出权”。这与中国大量参与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和产业园区建设的事实相一致。中国企业之所以拥有较长的时间视野，是源于中国本土的政商关系。从政府—企业关系来看，国有企业在对外投资合作，尤其是在承包工程领域的重要地位，赋予了中资相较于西方私人资本更长期的视野。^② 卡普兰在讨论中国在拉美的投资时指出，私人企业大多必须保持短期的盈利能力以安抚公司董事会，而中资更长的时间视野意味着不追求短期利润而期待长期回报。^③ 李静君同样强调了海外中资的国有主导，认为中国企业对经济利益和政治（安全）利益的并重使得中国企业在对外投资合作时更注重“生产导向”，而不那么易受市场波动的影响，故更具长期视野和稳定性。^④ 从政府—银行关系来看，中国的许多对外投资合作项目与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的发展型融资配套，而这些贷款通常拥有较长的偿还年限。债务国对中国的负债总额中，长期债务占比高达96%，为所有债权人中最高。^⑤ 在开发性金融的支持下，中资在海外中长期项目投资中具备更强的竞争优势。

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在对外投资合作中拥有较高的风险容忍度。在与发达国家企业进行比较时，不少研究者注意到中国企业对海外投资的风险偏好明显不同。有多项研究发现，中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时对东道国的政治风

① Justin Yifu Lin and Yan Wang, “The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Patient Capital as a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 *Journal of Infrastructure, Policy and Development*, Vol. 1, No. 1, 2017, p. 11.

② 需要注意的是，出于对政府—企业关系的讨论，此处侧重国有企业在对外承包工程领域所发挥的作用。事实上，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在对外投资合作中存在相互配合，这在中国本土的基础设施投资中其实亦有所反映，参见张军、高远、傅勇、张弘：《中国为什么拥有了良好的基础设施？》，载《经济研究》，2007年第3期，第4-19页。

③ Stephen B. Kaplan, *Globalizing Patient Capital: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ese Finance in the America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1.

④ Ching Kwan Lee, *The Specter of Global China: Politics, Labor and Foreign Investment in Afric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7.

⑤ 熊婉婷、张家诚、孙靓莹：《生产性债务：中国海外主权贷款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载《世界经济》，2023年第9期，第12页。

险不太敏感。^①与此同时，中国企业在许多所谓高风险地区还有不少建设中或运营中的承包工程项目。较高风险容忍度的另一体现是，部分中国企业将经济逆周期视为扩大业务的机会，与西方投资者在逆周期时往往选择减少投资甚至撤资形成对比。中国企业之所以拥有较高的风险容忍度，同样与中国本土的政商关系密不可分。从政府—企业关系看，国有企业在对外投资合作中通常能够容忍并克服更大的风险。国有企业部分承担着国家的发展政策，并在中国与其他国家通过政府间协议推动的标志性投资项目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为了帮助国有企业打破壁垒，防范可能的政治和安全挑战，母国政府更有激励运用手中的资源来帮助企业应对东道国投资环境中的各类风险因素。尤其是在资产专用性高且投资周期较长的领域，较高的风险容忍度对投资项目的成功实施和运营更为关键。从政府—银行关系来看，中国较低的融资成本为特定企业的对外投资合作提供了应对风险的融资支持。在开发性金融模式下，政府与银行合力促进了对基础设施等长周期、高风险项目的融资支持：一方面通过政府积极参与弥补了公共产品提供中的市场缺陷，另一方面通过强调项目运营业绩培育了市场机制。此外，对中国的银行贷款发放的研究发现，在信贷市场上国有企业更易获得较大额度和较长期限的贷款。^②这一特点虽然提高了特定企业软预算约束的可能性，但同时也有利于提升中国投资者应对投资风险的能力。

既然中国对外投资合作的特质和竞争优势反映了中国本土的政商关系，那么中国企业在参与对外投资合作的过程中也几乎必然伴随着相关发展知识的扩散。概括而言，蕴含中国发展知识的对外投资合作主要通过满足东道国两方面的需求来助力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一是通过基础设施等长期投资带动东道国经济增长。在所谓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下，欠发达国家难以利用发达国家的私营资本进行较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由此阻碍了发展中国家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并且不利于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价值链。在中国发展知识的推动下，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以及政府应在基础

^① 王永钦、杜巨澜、王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制度、税负和资源禀赋》，载《经济研究》，2014年第12期，第126-142页；Peter J. Buckley, et al., “The Determinants of Chinese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Vol. 38, No. 4, 2007, pp. 499-518; Ivar Kolstad and Arne Wiig, “What Determines Chinese Outward FDI?”, in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Vol. 47, No. 1, 2012, pp. 26-34.

^② 刘小鲁、聂辉华：《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怎么混？混得怎么样？》，人大国发院年度研究报告，2015年10月，总第6期，第25-29页。

设施投资中扮演更积极角色的观点被广泛接受，而中国投资者在满足东道国这一需求时无疑具有明显优势。^① 二是通过强调以国家为中心的治理模式加强东道国的国家能力建设。中国投资者在“走出去”过程中会不可避免地将其在本国熟悉的治理模式带到海外市场，而有效政府无疑是中国发展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斯洛博丹指出，西方新自由主义的策略之一便是为了促进全球化而削弱第三世界民族国家对其经济的权威。^② 不同于此，中国投资者希望发展中东道国可以更多地通过提升国家权力来解决问题，并且其较长的时间视野和较高的风险容忍度有利于提升东道国政府的议价权力，使其在更长的时间尺度上、更大的操作空间中规划和发展国家能力，从而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

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需求是多维度的，此处之所以重点关注基础设施投资与国家能力建设主要出于以下两方面原因。一方面，现代化是需要长时间投入资源的过程，而基础设施投资和国家能力建设分别意味着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领域的长期资源投入。^③ 另一方面，基础设施投资与国家能力建设之间存在相互加强、彼此促进效应。基础设施的日趋完善可以在范围和程度上增强国家嵌入社会的能力，而国家能力的提升反过来亦有助于基础设施投资的高质量、可持续进行。故观察对外投资合作对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与国家能力方面的影响是富有意义的。

三 基于中国企业投资巴西电力行业的考察

在本土发展的基础上，拥有较长时间视野和较高风险容忍度的中国企业成为中国开展对外投资合作的重要载体，也起到助力其他国家实现现代化的作用，特别是投资于本就需要较长时间视野和较高风险容忍度的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发展中国家要想实现持续发展，基础设施投资是一项重要任务。从性质来看，基础设施是一种特殊的“固定资本”。与很多机械与运输设备不

^① 裴长洪、刘斌：《中国开放型经济学：构建阐释中国开放成就的经济理论》，载《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2期，第63页。

^② Quinn Slobodian, *Globalists: The End of Empire and the Birth of Neoliberalis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③ 将国家能力建设作为国家行为体的“一项投资”的讨论，可参见陈兆源著：《投资国家能力：外国直接投资结构与发展中世界的国家建设》，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

同，基础设施在空间上是无法移动的^①，这就意味着发展中国家无法像进口很多其他资本品那样通过货物贸易来解决基础设施方面的不足，只能自己组织力量来完成投资。基础设施行业既包含交通运输、邮政通信等方面的设施建设与服务，也包含了为生产生活提供水、电、气等的公用事业行业。此处以中国企业对巴西电力行业的投资合作为例来具体说明以对外投资为载体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知识扩散。

巴西在电力基础设施方面有着较大潜在需求，这也为中国企业对巴西电力行业开展投资提供了广阔合作空间。由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债务问题及 90 年代之后的私有化改革等原因，整体上巴西基础设施投资力度不足。^② 据研究统计，1992—2013 年间，巴西基础设施投资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平均占比约为 2.2%，不仅远不及同为新兴市场国家的中国（8.6%）和印度（4.9%），也略低于基础设施已较为完善的美国（2.5%）和欧盟（2.5%），甚至还达不到拉美平均水准（2.4%）。^③ 具体到电力领域，发电和输电基础设施建设的滞后给巴西部分大型工业区域造成了断电困扰。^④ 一方面，巴西需要进一步加强投资电力部门，实现电力来源多元化，以满足经济增长和人口增加的需求。^⑤ 巴西是对水电依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如图 3 所示，巴西发电量中水电占比曾一度达到 90% 左右，如今虽有所下降，但仍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也远高于中国。巴西对水力发电过度依赖的问题在 2001—2002 年旱情期间充分暴露。由于水库水位下降，发电资源不足，巴西不得不采取强制性的用电配给政策，这也引发了巴西新一轮的电力行业改革。^⑥ 另一方面，巴西还要通

① Giovanni Arrighi, *Adam Smith in Beijing: Lineages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07, p. 216

② Edmund Amann, et al., “Infrastructure and Its Role in Brazil’s Development Process”, in *The Quarterly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Vol. 62, 2016, pp. 66–73; Celio Hiratuka, “Chinese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in Brazil: Two Case Studies”, in Enrique Dussel Peters, Ariel C. Armony, and Shoujun Cui (eds.), *Building Development for a New Era: China’s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2018, p. 127.

③ Celio Hiratuka, “Chinese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in Brazil: Two Case Studies”, in Enrique Dussel Peters, Ariel C. Armony, and Shoujun Cui (eds.), *Building Development for a New Era: China’s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2018, p. 128.

④ [美] 维尔纳·贝尔著，罗飞飞译：《巴西经济：增长与发展》（第七版），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2014 年，第 208 页。

⑤ Annabelle Mourougane and Mauro Pisu, “Promoting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in Brazil”, *OECD Economics Department Working Papers*, No. 898, 2011, p. 20.

⑥ [美] 菲雷顿·P. 萧山西等著，王冬容等译：《全球电力市场演进：新模式、新挑战、新路径》，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 年，第 352–359 页。

过投资解决电网建设和电力输送问题。从地理上看，巴西的用电中心和水力发电资源在很大程度上是分离的，80%的用电量在南部和东南部，而发电却要依靠水力资源丰富的北部亚马孙河流域，从北部到东南部的电力输送跨度超过了2000千米。^① 所以，无论从电力开发还是电力输送角度来看，电力行业投资对巴西均具有重要意义，也为中国企业依托自身竞争优势开展对外投资合作创造了机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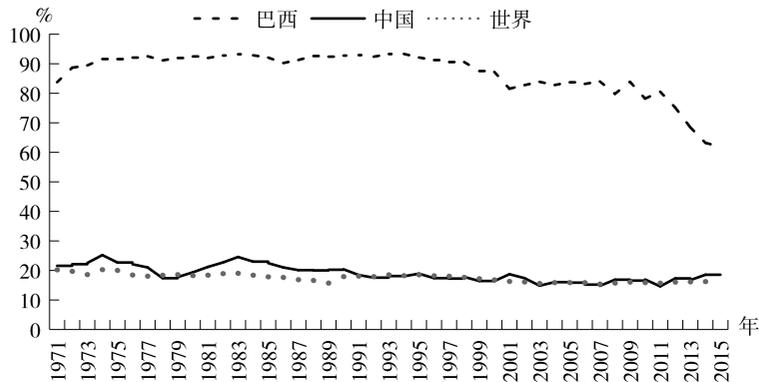


图3 中国和巴西水力发电占比情况

资料来源：世界发展指数（WDI）数据库。http://databank.worldbank.org/. [2023-11-10]

中国企业在巴西的投资同时涉及电力开发和电力输送环节。在电力开发方面，中国长江三峡集团2013年成立三峡巴西公司，在短短几年已经发展成为巴西第三大发电企业，截至2020年共拥有装机量超过800万千瓦的水电项目17个和风电项目11个。^② 鉴于中国企业海外发电项目受到的关注和讨论较多，此处侧重于分析国家电网在巴西输配电领域的投资及影响。2010年欧洲债务危机背景下，在巴西拥有输电领域特许经营权的一家西班牙企业希望出售部分资产，中国国家电网抓住这一机会进行并购，于2010年成立中国国家电网巴西控股公司（以下简称“国网巴控公司”）。^③ 2010年和2012年，国家

^① 《国家电网：中国输电标准走入巴西》。http://ysp.net.sasac.gov.cn/n2588025/n2588124/c9227863/content.html. [2023-11-10]；国网能源研究院有限公司编：《2021国内外电网发展分析报告》，北京：中国电力出版社，2021年，第34页。

^② 参见三峡国际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官网介绍。https://www.ctgi.cn/ctgichina/1047919/1047902/index.html. [2023-11-10]

^③ 具体过程参见陈涛涛等著：《中国企业投资拉美与“一带一路”倡议》，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22年，第149-152页。

电网两次收购了巴西 12 家输电特许权公司 100% 的股权，通过设立集控中心等方式加强本土化经营，并且通过与当地企业合作积累了市场经验。^①

国网巴控公司在巴西经营活动的一个代表性项目是参与巴西美丽山输电项目建设。该项目建设的主要目的是将电力从位于巴西亚马孙河流域的美丽山水电站（巴西第二大水电站）输送至用电负荷集中的巴西东南部，该项目也是巴西历史上最大的输电项目。美丽山输电项目的建设共分两期完成，项目一期工程为国网巴控公司和巴西电力公司旗下企业联合中标，建成后于 2017 年 12 月投入运营。2015 年该项目二期工程竞标时，巴西正面临经济危机考验，之前和国网巴控公司合作投标的东道国企业也面临融资困难特别是短期资金困境，于是国网巴控公司选择独立投标并成功中标。^② 2019 年 10 月，美丽山项目二期工程成功投入运营。美丽山输电项目为东道国巴西带来了显著的经济收益和社会效益。首先，美丽山输电项目的建成通过“北电南送”改善了巴西的电力输送和用电条件。该项目作为世界上距离最长的 ±800 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长超过 2500 千米，由南向北穿越巴西 5 个州、81 座城市，可以将美丽山水电站提供的大约 3/4 电能输送至巴西东南部，满足里约热内卢、圣保罗等区域 2200 万人用电需求。^③ 此外，国网巴控公司通过参与项目建设还在客观上起到了创造市场的作用。在参与项目的过程中，国网巴控公司很好地实施了设备和人员的本地化，不仅可以为巴西本土的电工设备和原材料等相关产业提供新的市场，还创造了 2.5 万个就业岗位。^④ 同时，国网巴控公司将注重社会责任贯穿整个项目建设，既包括严格执行环保标准、保护自然环境，还包括在卫生健康、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方面帮助改善当地社区居民生活。^⑤

根据已有研究总结巴西电力行业管理机构、国网巴控公司的合作企业以及当地媒体报道对国网巴控公司的评价，可以认为国网巴控公司是一家“被

① 陈涛涛等著：《中国企业投资拉美与“一带一路”倡议》，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22 年，第 149 - 154 页；张慧：《国家电网 120 亿元收购巴西电力企业 成为巴西第三大输电运营商》，2016 年 7 月 3 日。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726155.html. [2023 - 11 - 10]

② 陈涛涛等著：《中国企业投资拉美与“一带一路”倡议》，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22 年，第 156 - 157 页。

③ 国家发改委：《巴西美丽山水电送出一期、二期工程项目》，2021 年 12 月 28 日。https://www.ndrc.gov.cn/xwdt/ztl/zlcnjyutzhz/202112/t20211228_1310282.html. [2023 - 11 - 10]

④⑤ 钟宏武、张闽湘著：《中央企业海外社会责任蓝皮书（2020）》，中国社会责任百人论坛，2020 年 8 月，第 59 - 61 页。

巴西当地社会普遍认可的国际化企业”^①，是中国对巴西电力行业开展投资合作的有力依托。那么，为何国网巴控公司能够承担这样的角色？具体原因是多方面的，企业自身的技术和工程经验积累、对市场机遇的把握以及合理的经营策略等都很重要，但不能忽视的一点是中国国内经济环境和政商关系给国家电网持续成长和发展创造的条件。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紧密协调的政商关系让中国电力行业的任务导向型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国家电网的技术能力和经营能力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提升，这也是国网巴控公司参与巴西的任务导向型投资竞争优势的国内基础。

改革开放之后一段时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市场化改革的持续推进，中国国内电力生产和供应方面的短板开始显现，对电力行业的发展也提出新的挑战。1993 年左右，中国出现了一次严重的经济过热。是年全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增幅达 14.7%，已接近 20 世纪 80 年代末的高点，随后该指数在 1994 年更是上涨 24.1%。从产业基础的角度看，包括电力部门在内的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发展的相对落后是导致经济过热的一个重要原因。1993 年 6 月，党中央和国务院下发的《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指出：“由于工业增长速度越来越快，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的‘瓶颈’制约进一步强化……电力、油品供需缺口越来越大，有的地方又出现‘停三开四’现象。”^② 虽然中国成功应对了这次经济过热，实现了经济“软着陆”，但这也从另一角度说明了电力行业改革和发展的迫切重要性。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电力行业与国内其他许多行业一样，归口于电力部和各地电力局这一特定政府部门管理。改革开放之后，电力系统也在市场化的大趋势下发生着变革。1997 年，新成立的国家电力公司承接了电力部的企业管理职能，各地电力局则成为国家电力公司的下属公司。次年，电力部在政府机构改革中被撤销。^③ 2002 年，电力行业进行了被称为“厂网分开”的改革，原先的国家电力公司被拆分为五家发电企业、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两家输配电企业和其他四家企业。这次改革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发电环节和输

^① 陈涛涛等著：《中国企业投资拉美与“一带一路”倡议》，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22 年，第 158 - 166 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年，第 312 页。

^③ [美] 菲雷顿·P. 萧山西等著，王冬容等译：《全球电力市场演进：新模式、新挑战、新路径》，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 年，第 423 页。

配电环节由不同企业承担，五家发电企业和两家电网企业拥有 40% 的全国发电容量。^① 上述变化推动了国内电力行业实现政企分开，但没有打断政企协作，也没有改变中国政商关系的基本特征。电力作为重要战略性行业，国有企业仍在其中占据关键地位。紧密协调的政府—银行关系也让电力企业得到低成本融资。国有发电公司可以利用国有银行信贷资金克服依靠地方政府、外国投资者和资本市场融资的局限。^②

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国内发电量快速上升。如图 4 所示，2000 年中国年发电量仅 13556 亿千瓦时，占世界总量的比重不到 9%，到国网巴控公司成立的 2010 年，中国年发电量已达到 42071.6 亿千瓦时，几乎与当时美国 43942.5 亿千瓦时的年发电量相当，占世界的比重也提高到将近 20%。2022 年，中国年发电量增至 88487.1 亿千瓦时，占比超过全球的三成，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大发电国的地位愈发稳固。发电量和用电需求的增加也给作为输配电企业的国家电网创造了巨大的市场机会，包括“西电东送”这类国家主导的大型工程让国家电网有机会不断提升自身的技术能力和经营能力。一个最直观的表现便是中国每年输配电过程中电力损耗占发电量的比重呈现持续降低趋势，从 2000 年的 7% 左右降低到 2014 年的约 5.5%。^③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高压和超高压输电技术不断发展，为特高压输电技术提供了积累基础，客观上让国网巴控公司可以凭借世界领先的特高压输电技术参与美丽山输电项目建设。截至 2021 年 9 月，中国的运特高压线路已经达到“14 交 18 直”，其中“14 交 14 直”在国家电网公司经营区域。^④

与此同时，中资金融机构也在促进中国和巴西的投资合作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目前，中国和巴西两国在改善后者融资条件方面有着多样化的合作形式，包括金融机构在巴西设立分行或代表处、新开发银行及中拉产能合作基金等。^⑤ 以政策性银行为例，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从 2006 年起通过直贷、转贷、

① [美] 菲雷顿·P. 萧山西等著，王冬容等译：《全球电力市场演进：新模式、新挑战、新路径》，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 年，第 426 页。

② Chi Zhang and Thomas C. Heller, “Reform of the Chinese Electric Power Market: Economics and Institutions”, in David G. Victor and Thomas C. Heller (ed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ower Sector Reform the Experiences of Five Major Developing Countri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105.

③ 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 (WDI) 数据库。

④ 国网能源研究院有限公司编：《2021 国内外电网发展分析报告》，北京：中国电力出版社，2022 年，第 74 页。

⑤ 王飞：《中国—巴西基础设施建设合作：进展、挑战与路径选择》，载《国际问题研究》，2020 年第 1 期，第 59—60 页。

保函、本外币融资等多种金融工具为包括国家电网在内的多家中资企业在巴西投资提供支持，同时也与巴西企业深入开展合作。^① 作为首个出具巴西雷亚尔保函的中资银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为国家电网提供了信用背书，在降低两国水电项目合作成本的同时也有助于国家电网从巴西当地获得商业性贷款。^② 由此可见，中国企业参与对外投资合作也与中国自身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支持密切相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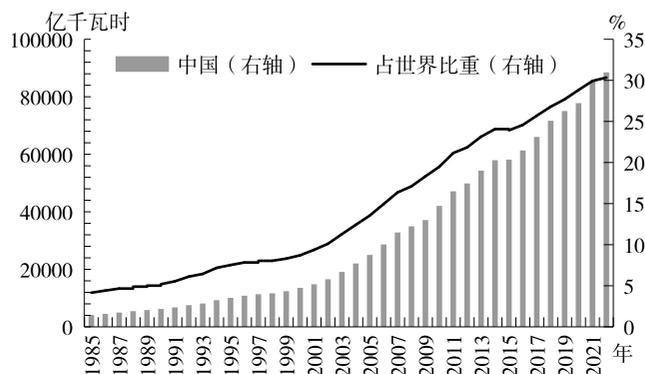


图4 中国发电量及占世界比重的变化

资料来源：Energy Institute,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23”. <https://www.energyinst.org/statistical-review>. [2023-11-10]

中国与巴西电力行业投资合作的案例表明，中国本土的政商关系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对外投资合作过程中发挥着重要影响。国家在本土为企业创造成长与发展机会，成长起来的企业则可以成为中国开展对外投资合作的有利依托，尤其是在基础设施建设这样需要较长时间视野和较高风险容忍度的行业领域。从政商关系跨国互动的视角看，前一阶段是中国本土政商关系对发展知识的提炼，并借此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后一阶段则是中国企业在对外投资合作过程中对发展知识的扩散，同时企业也通过传播运用所习得的发展知识来助力巴西等发展中东道国的现代化进程。

^① 《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实现与巴西开发银行5亿美元综合授信项目全额发放》，新华网，2023年11月15日。<http://www.xinhuanet.com/money/20231115/a6fa13b9cd044e51be75726722ad063e/c.html>. [2023-12-03]

^② 崔守军、焦玉平：《中国对拉美开发性金融合作研究》，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0年第3期，第157页。

四 总结与启示

中国式现代化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① 其中，对外投资合作是连接中国式现代化与世界现代化的重要纽带。在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的同时，中国对外投资合作还反映并扩散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知识，从而助力发展中国家启动或推动其现代化进程。以对外投资合作为载体，文中构建了一个跨国政商互动的分析框架，来理解全球化背景下的现代化。在此分析框架下，本文试图回答前后相连的三个问题。一是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着什么样的发展知识。中国本土政商关系是提炼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知识的一个重要观察视角。中国政府依靠与企业部门和银行部门的紧密协调，通过发起并实施任务导向型投资成为市场的重要创造者，推动了中国国内的现代化建设。二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知识如何塑造了中国对外投资合作的特质与优势。中国本土紧密协调的政商关系促进了国有企业等各类企业参与对外投资合作，并通过开发性金融提供相应支持，使中国企业在对外投资合作中总体上表现出不同于西方传统资本的两方面竞争优势，即较长的时间视野和较高的风险容忍度。三是中国对外投资合作的特质如何有助于满足发展中东道国实现现代化的需求。蕴含中国发展知识的对外投资合作满足了东道国在基础设施投资和国家能力建设两方面的需求，从而助力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

基于上述跨国政商互动的分析框架，本文对中国企业参与巴西电力行业的投资合作进行了案例考察。巴西相对滞后的电力基础设施建设制约了其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以国家电网为代表的中国企业拥有先进的发电和输电技术，并且有较长的投资时间视野和较高的风险承受能力，参与了巴西多个大型电网建设项目。在对巴西电力行业的投资合作中，中国企业不仅完成了项目建设任务，还在当地取得了良好的经济社会效益，获得巴西方面广泛认可，提升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影响力和吸引力。中国电力企业在对巴西的投资合作中体现并扩散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知识，助力巴西推动现代化建设，实现了互利共赢。当然，本文的分析框架和理论观点也可更广泛地用于

^① 习近平：《中国式现代化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载《求是》，2023 年第 16 期，第 8 页。

分析中国对非洲和东南亚国家的投资合作。

在上述研究发现的基础上，本文也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启示意义。就理论启示而言，国际关系学者在参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学术讨论时，应更加重视国内和国际互动的政治经济学视角。这是国际政治经济学与比较政治经济学相交的区域，并且该区域的重要性正在日益放大。^① 中国式现代化所蕴含的发展知识超越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窠臼，体现了中国在现代化问题上走向“话语自主”的理论建构。^② 基于本土政商关系挖掘提炼的发展知识同样能为国际关系研究提供新的解释变量和理论机制。就实践启示而言，本文所讨论的发展知识扩散不同于某些国家对所谓“善治”的强行推广。推广“善治”往往被用作促进西方利益和价值观的工具，这也导致一些国家对此的反弹。^③ 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知识扩散应避免这种情形，积极回应所在国政府和当地社区的需求和优先事项，在对外投资合作中分享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知识和治理经验，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能力建设，提高其在引入外部资源时的自主性与主导权。中国要继续强化并优化政府、企业、银行之间的协调配合，进一步增强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推动高质量的对外投资合作，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

（责任编辑 史沛然）

① 朱天飏著：《比较政治经济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9页。

② 韩庆祥：《中国式现代化的哲学逻辑》，载《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7期，第104页。

③ Alina Mungiu-Pippidi, “The Rise and Fall of Good-Governance Promotion”, in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31, No. 1, 2020, pp. 88-102.